

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篇目 (见第2版)

肩负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 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智慧力量

刘云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文化改革发展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我国文化建设从全局和战略上进行了部署。在刚刚闭幕的九次文代会、八次作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就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学艺术事业繁荣发展作了新的动员,对广大文化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学习领会好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建设文化,也就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问题。必须以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来认识文化的地位作用,切实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使命、历史责任。

1.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纽带、是引领前进的旗帜。文化最大的特质,就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始终是血脉和纽带,铭刻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的认同。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文化是引领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旗帜和号角,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文化进步为先导。近代欧洲一批国家的崛起可以说是源自于文艺复兴,正是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将欧洲推向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近代中国重新踏上民族复兴之路,也是从文化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开启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很重要的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以思想上的新解放、文化上的新进步推动了事业的新跨越。事实证明,文化深刻体现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造力生命力,是民族生存发展、国家繁荣兴盛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不可能兴盛强大,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文明进步的标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繁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特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同发展是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人们对文化功能定位的认识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发展,需要文化有一个更大的繁荣进步。从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看,文化不仅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而且在提升发展质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资源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文化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文化产业日益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只有当文化表现出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发展具有更多文化含量的时候,经济发展才能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从文化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看,文化是“润滑剂”、“减压阀”,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自身的和谐,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滋养。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加速期,如果不重视培育理性和和谐的

理念和精神,不注重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看,全面建设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有发达的经济,也要有繁荣的文化,既能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文化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

3.文化是民生幸福的要义、是美好生活的保障。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塑造着人。文化对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人们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归依。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始终是幸福生活和美好人生的内在要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吃饱穿暖等物质方面的需求,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更加迫切、愿望更加强烈,文化越来越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改善民生,社会上也在热议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实际上离开了文化,民生的改善就是不全面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也难以得到保障和提升。这些年,我们在改善文化民生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大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城乡、区域文化发展还不平衡,一些地方群众看书看报难、看电影电视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实现人们的“文化温饱”,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日益多样化、个性化文化需求,让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需要把文化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需要我们付出更大努力。

4.文化是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是综合国力的有力支撑。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文化与经济相融合产生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有人认为,如果说过去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军事的较量,未来将以文化论输赢。现在,许多国家都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战略,利用文化展示本国形象、拓展国家利益。美国制定了《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欧盟20多个国家发表了各自的文化政策官方文件,日本和韩国也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增加值已占到GDP15%以上,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传播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化软实力成为实实在在的硬实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不相称,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纲领、文化设计、文化理想,没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的。只有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快构筑我们的文化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描绘了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路线图”和宏伟蓝图。为新的文化征程开路、为中华文化复兴献力,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四个一批”人才作为宣传

文化领域的优秀代表,更应勇担重任、走在前列,切实发挥好引领表率作用。

第一,秉持崇高文化追求,在弘扬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发挥引领表率作用。树立什么样的文化理想、坚守什么样的文化立场、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始终是文化工作者修身立业的根本。古今中外,那些挺立时代潮头的文化先驱,那些彪炳史册的名家大师,无不拥有高远的文化理想、高尚的价值追求,无不把实现个人价值与推动历史发展进步有机结合。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坐标,才能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才能启迪人们心灵、引领社会前行。在当代中国,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文化工作者,都应当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做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要满腔热忱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鼓与呼,用多种多样的文化形式,用高质量的优秀作品,生动形象地表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兴国之魂、传承文化精髓、礼赞高尚情操,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功能。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新闻宣传,还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都要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基本遵循、作为衡量标准,融入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融入自己的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为时代放歌、为民族写史、为人民立传,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召人们、影响社会。

第二,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上发挥引领表率作用。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精神父母,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本。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理当做人民喜爱的文化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增强大众情怀、摒弃小众意识,想问题、做事情都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都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意愿,自觉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服务群众作为基点和归宿,感知群众冷暖、关注群众诉求,多宣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多表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多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体现文化工作者的价值。生活最深刻,群众最智慧,泥土最芬芳。与群众越贴近,对生活的理解越真切,我们的文化工作越能得到人民的认可。现在,广泛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给宣传文化工作带来一股清新务实之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改进宣传文化工作的根本措施,是宣传文化工作者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应当成为宣传文化战线的一种“常态”。实践也启示我们,文化工作者应该经常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在路上,心中才会有时代;在基层,心中才会有群众;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动。希望“四个一批”人才发挥带头作用,多到基层、到一线去,走进生活深处、走进人民心中,把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成最好的老师,在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中汲取智慧营养、增长本领才干。

第三,保持与时俱进品格,在投身改革实践、推动文化创新上发挥引领表率作用。文化总是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前进的,也是在创新创造中实现发展的。只有创新创造,才能达到学术艺术的高峰,才能实现文化园地的繁荣昌盛,才能焕发文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当代中国文化工作者要有所造诣、有所成就,就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继承发扬前人的文化创

造,吸收借鉴国外有益文化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要增强改革意识,深刻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对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特殊重要意义,深刻认识破解文化发展难题需要改革,增强发展活力动力需要改革,开创文化发展新局面关键也在改革,积极主动地支持改革、投身改革,做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实践永无止境,创新也永无止境。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始终把创新作为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境界,以敢为人先的胆识、超越前人的勇气,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推进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表现形式创新,推进传播方式、经营模式、管理手段创新,在开辟文化发展新天地中留下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光辉印记。

第四,强化精品意识,在创作生产更多高质量、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上发挥引领表率作用。文化精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创造水平,精品纷呈、佳作迭出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年,我们不乏优秀作品,但真正能够称得上经典的还不多。时代呼唤更多的精品,人民期待更多的佳作。打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精品,是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关注现实生活、不断开阔视野,增强对生活的感悟能力,丰富自己的文化实践,努力把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融汇起来,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统一起来,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要加强学习、勤于汲取、善于积累,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学习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打牢根底、扩大储备、丰富学识,为创作精品打下扎实基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付出才会有所回报。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笃定志向、潜心创作,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使我们的作品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的检验。

第五,坚持崇德敬业,在恪守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发挥引领表率作用。人品决定文品,为文先要立德。宣传文化工作者是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担负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责任,只有自己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创作出启人心智、震撼心灵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优秀文化工作者,秉持德艺双馨的崇高追求,以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奉献,以对艺术和事业的执着坚守,为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文化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四个一批”人才是文化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很多已经是社会名人。社会影响越大、关注度越高,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珍视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珍惜时代和社会提供的舞台,努力做道德品行和职业操守的示范者。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严肃认真地考虑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效果,坚持文以载道,讲品位、讲格调、讲境界,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让美好的道德与情感成为人们的精神营养。要加强自身修养、锤炼思想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淡泊名利、自尊自律,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用人格力量赢得社会尊重、赢得人民赞誉。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2011年12月2日在第五期“四个一批”人才研修班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原载于2011年12月6日《光明日报》)

让“红色爱情”变得“陌生”

——武歆访谈

□本报记者 颜慧

记者:据我所知,长篇小说《延安爱情》是你文学创作的一个“节点”,之前你并没有涉及过“红色”题材的创作。是什么让你开始对这一领域有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和近乎执著的创作热情?

武歆:你说得对。我从1983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将近30年了,在写作《延安爱情》之前,从来没有碰过“红色”题材,因为一直怀有敬畏感。总觉得“红色”题材是“宏大叙事”,高大而遥远,因此之前一直热衷于都市“小人物”题材的创作。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红色”题材的看法,或者说热爱上了“红色”题材——这源于一位相识了20年的“延安老革命”。老人今年90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他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后来他抛弃家产,中断学业,历尽艰辛,投奔去了延安。在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去看望老人,在聊天中,老人望着窗外,忽然动情而又伤感地对我说,他特别想回到延安看一看,可由于身体原因,再也回不去了。于是,老人给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延安的生活、学习,特别讲了他的“延安爱情”。在那个平静的春天的午后,老人眼含泪花,格外动情。关于这个情节,我曾跟许多记者朋友谈过,但今天还想再讲。就是因为这个情节,让我以前一直敬畏的“红色”,忽然来到了我的身边,并且觉得是那样亲近、那样温



暖。后来,我翻阅了一千多万字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革命者的生活史料。我深陷其中,越发感到“红色”题材的独特魅力,感受到革命者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我也意识到,这是一座丰富的创作宝藏。在创作《延安爱情》的中途,我就有了创作“红色爱情长篇系列”的想法:表现抗战时期所形成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内,知识青年在当时不同生活境遇下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向往,还有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及内心的真挚情感。我试图在更加接近真实生活的情境下,去表现他们对革命理想和信仰的追求。

记者:将“红色”和“爱情”相结合是一个吸引人的亮点,但是也容易让人落入程式化的想象。你是如何做到让这一题材与当代读者产生共鸣的?

武歆:过去一提到红色的革命爱情,总会使人想到“主义、理想、牺牲、奉献”等高亢嘹亮的字眼,似乎那些革命者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圣徒。我也曾这样认为过。但随着对“红色”题材理解的不断加深,我在写作中有意识地颠覆这样的传统印象,因此在作品中用更多的笔触去表现“革命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在日常状态下的生活图景”。我试图将“红色爱情”变得“陌生化”,所谓“陌生”,实际上就是通过“爱情视角”,更加文学性地表现过去的红

版,同名38集电视剧已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和八套播出。表现“敌占区”的《北平爱情》即将出版,同名30集电视剧马上就要开机。同样表现“敌占区”的《天津爱情》已在《中国作家》今年第7期发表,并经过两次修改和增删后,单行本明年初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现正在创作表现“国统区”的《重庆爱情》,初稿很快就能完成,当然还要放置一段时间,再进行修改和整理。

记者:能简要介绍一下这几部“爱情”的情节吗?

武歆:《延安爱情》写了一个封建家庭子弟,为了爱情、为了追随心爱的进步女青年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北平爱情》写了有着不同人生追求的两个男人,因为遭遇爱情,最终人生换位,走向各自的对立阵营;《天津爱情》写了两个年轻的革命者,因为爱情,从轰轰烈烈的事业巅峰,走向了事业的平淡,最终放弃仕途,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更加闪光夺目。《重庆爱情》暂且保密吧,因为正在和出版、影视机构洽谈,要为人家考虑呀。

记者:看来“红色”已经成了你近年来创作的主题或者说“主旋律”。除了这个系列,你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武歆:是的,这几年我一直把重心放在“红色爱情系列”的创作上,尽管写得很辛苦,但也很充实,感觉很有意义。除此之外,我也在进行另一个有关“红色题材”的创作。去年初我在延安“定点深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感受颇丰,随后又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现正在创作“游记体”长篇小说《陕北往事》,其中部分章节已经写完,并已在《大家》《中国作家》等刊发表。《北京文学》等刊也将陆续发表后面的章节。另外,明年下半年,我准备暂时回归现实题材,到天津的

滨海新区去深入生活,创作反映当代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我现在正为这部小说做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

记者:前不久跟随作家调研团去宁夏最贫困的西海固地区,听你谈到了深入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深入生活对你而言是什么?

武歆:小说创作需要叙述技巧、叙事谋略,需要深刻的思想,但也更需要“将书里的思考与行走相结合”。因为文学隐藏在民间,出其不意的情节与精妙的细节,就在民间生活的皱褶中。通过深入生活得来的经验,比书本上的经验要更加鲜活,更富有人间气息。多多行走在山野间、大山大河间,多面的立体生活会激活书房里的平面思考。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平日除了读书、写作,与外界联系不多,至今没有博客,也没有微博。但我并没有放弃“行走”,放弃任何民间走访的机会。比如为了写作《重庆爱情》,我年初时就自费前往重庆,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得到了许多创作灵感,也得到了重庆文学院、《红岩》杂志的协助和支持。你说到的此次宁夏西海固之行,依旧使我感受很多。尤其是调研团全体成员在红军长征会师地将台堡的祭奠缅怀,让我了解了发生在西海固的一些红色往事,回来时我带了许多关于宁夏的各种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我对红色题材的理解。说不准将来我的“红色爱情系列”可能还要继续创作下去,比如可能写一个“淡定的、从容的、安静的、回汉民族感情相连的红色爱情故事”。我把读书比做作家的一只翅膀,那么深入生活对我而言,就是另一只翅膀。只有拥有了双翅,才能避免折戟。

面对